

CHU



楚晖



K26-51
0
1:1



封面设计：卢 飞

楚 晖 丛书

(1)

•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84,000 字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300

统一书号：11106·131 定价：1.16 元

出版说明

为了保存和积累革命史资料，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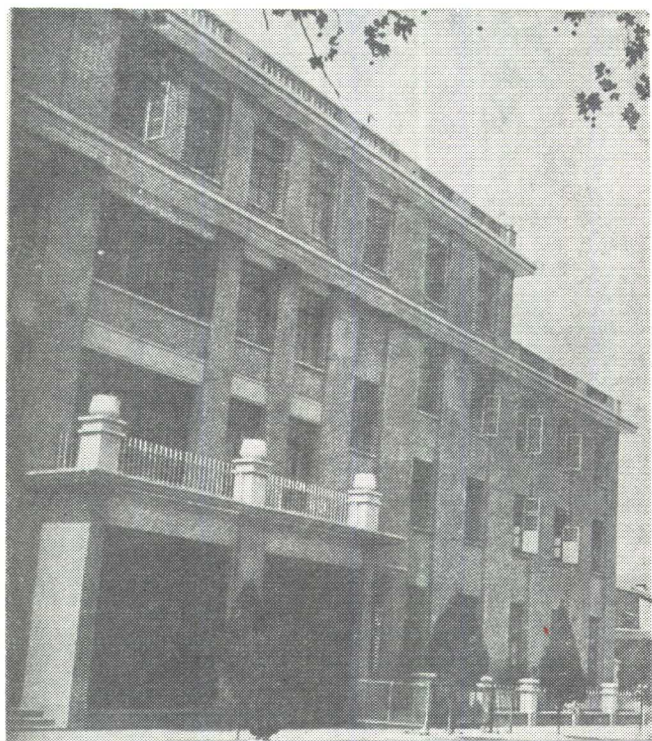
这套丛书主要刊载“五四”运动以来党在湖北地区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其中包括回忆录、人物、革命故事、史料、革命旧址及文物介绍等。计划每年出版二至三辑，其中资料部分如有不尽详实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欢迎当年参加湖北地区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为本丛书积极撰写亲身经历和见闻，欢迎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单位的同志、各地文物保管单位的同志和其他作者撰写各类稿件。来稿体裁不拘，但史料要求真实可靠，文字力求生动活泼。

一九八〇年四月

本面照片均为郑智德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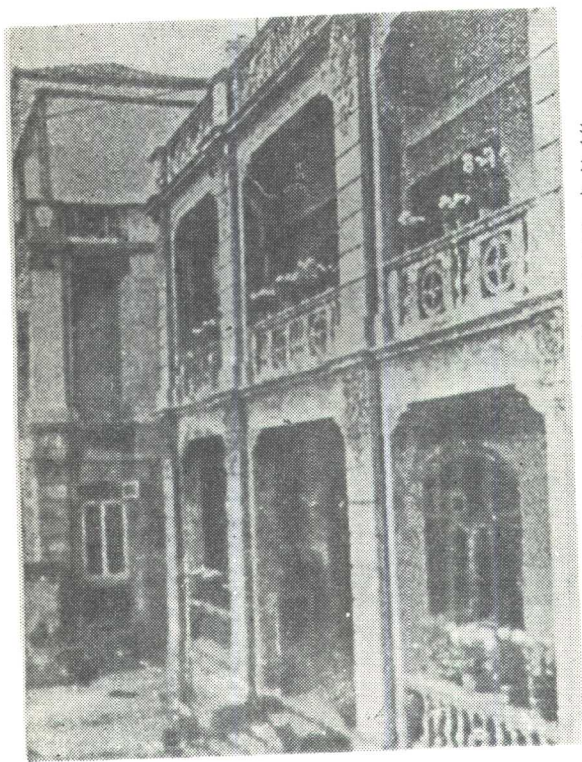
下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上图：八七会议会址。



普海春酒楼。



湖北省总工会旧址。



楚 晖 丛 书

第一辑 目 录

—— 回 忆 录 ——

- 回忆党的“一大”.....陈潭秋(1)
董老忆潭秋.....《陈潭秋》编写组整理(6)
回忆董必武同志.....罗章龙(11)
刘少奇同志与武汉工人运动.....张志善 郑自来整理(19)
鄂中的一炬抗日烽火.....达 胜 穆 原(45)
武汉地下党的一个重要交通站.....赵忍安(74)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包惠僧(86)

—— 人 物 ——

- 林祥谦.....李新顺 王教生 史定兴 潘光钰 孔祥祜(99)
施 洋.....史定兴 冯长机 潘光钰 (130)
周逸群.....张广立 (163)
何功伟.....湛宗仁 蔡树晖 雷正先 (188)

目 录

革命故事

- 在贺军长身边养伤……………张明才 (219)
奇袭取胜……………中共房县县委宣传部 (226)

史 料

- 党在湖北的第一个支部——武汉支部……………谢经华 廖惠民 (231)
武汉国民政府大事纪要……………毛 磊 刘继增 袁继臣 (246)
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前前后后……………史求实 (290)
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资料(简编)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辑录 (306)
“五四”时期的武昌利群书社……………廖鑫初 (341)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错误及其危害……………马建离 宋镜明 (353)

革命旧址简介

- “八七”会议会址……………郑自来撰文 (372)
……………郑志德摄影(封二)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傅春霞撰文 (373)
……………郑志德摄影(封二)
普海春酒楼……………刘 长 荪 撰文 (375)
……………照片由湖北省博物馆供稿(封三)
湖北全省总工会旧址……………刘 长 荪 撰文 (376)
……………照片由武汉市文物管理处供稿(封三)

回忆党的“一大”

陈 潭 秋

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了厨师兼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暑假。一个熟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作饭。另外，他的任务是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由于有认识的人向厨师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这九个客人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

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九人里面，有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山东济南的代表王烬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严重的工作侵蚀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成为托洛茨基派，被党开除了党籍。广东的代表是包惠僧。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是周佛海，他不久在广东进行反党活动，被党开除。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

以外，还有代表北京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李汉俊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他被安徽军阀枪毙。李达则在五卅后退出了党。广东第二个代表是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时，帮助了陈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过党的屡次警告，终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很快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分子。

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在第一次党代会后，陈独秀参加中共领导很久，在一九二七年革命严重时期，他坚持投降政策，出卖了革命事业。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大会的组织非常简单。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学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四天，讨论以下的问题：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和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部分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主张首先应真正地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地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主张党应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的某一组织和

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当时拥护李汉俊的观点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这两个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能否采取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大会通过了这些方针。最后通过党章，放在会议的第四日的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个穿长褂的可疑人物，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王某，后又说找错了，很快溜了出去。对的，相距李汉俊房子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的组织。但大家都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因此我们认为这人非常可疑，大家很快收集文件，隐藏了起来。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真的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来了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大家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估计侦探是从女子学校追踪探知我们的。

在开始时，我们计算七天完结大会工作，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五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继续进行大会工作的适当地点。后来一度决定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发前，又作出判断，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随后，决定改在嘉兴的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象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他们后面就有人钉梢了。那天早上是阴天，在八点钟后，就有许多游人，因此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些困难，但在十点钟时，下起小雨来，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我们一直讨论到晚上十一点，除了最后通过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和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然后选举中央局的委员。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引起了不大的争论。包惠僧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和对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把他看得更坏一些，因为孙中山的宣传，容易使群众彷徨。这一主张受到了大会代表的反对。大会对这问题通过了以下的方针：一般地说，对孙文学说应有批评地、有区别地对待，但他的个别的、实际上是进步的行动应予以拥护，可采取党外形式和他合作。通过了这一原则，可以说为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石，同时也是发展反军阀和反帝运动的基础。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前，除了在日本、法国留学生、侨民中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是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了和当时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

在临时中央局里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候补委员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

这样即结束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伟大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引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中国共产党。



董老忆潭秋

(本文是根据董必武同志的多次回忆，由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潭秋》编写组整理)

陈潭秋同志是湖北省黄冈县人，有兄弟八人，他行七。他五哥树三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因公丧命。他弟弟荫林，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曾在武汉中学教过英语课，后作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因天气炎热，长途跋涉，积劳成疾，病逝瑞金^①。

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那年春天，我从从事士兵运动的川鄂交界的山区来到上海，适逢李汉俊刚从日本学成回国，他在日本看了许多左倾书籍，倾向马克思主义。通过他的介绍，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那时，我们都住在渔洋里，他住路北，我住路南，经常在一起谈论俄国劳农革命(当时这样称十月革命)，我们都感到过去革命工作不依靠工农群众，方向不对，要从头来^②。“五四”爱国运动中工农群

①董必武同志办公室给湖北省民政厅的信。

②《董老的嘱咐》，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青年报》。

众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侧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①。

一九一九年冬天，我回到武汉。由于物质条件困难，报纸没办成。于是我和谭秋等朋友商量后，决定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房子筹办武汉中学。经过筹措经费，修缮房屋，聘请教员，招收学生，以及在官厅立案等多方面活动，一九二〇年初，武汉中学终于开学了。这中间谭秋出了很大的力。办学之初，只有三间教室，一间大办公室，这间大办公室还兼作教职员宿舍。此外，有一个不大的操场，有可供学生食宿用的两排平房和一些破烂桌椅，经过修补添置，一百多名师生算是勉强住下，开始授课。当时，我担任学校董事，并任甲乙两班国文教员，我也教起书来。语文别人不大愿意教，我不是学师范的，但为了宣传革命，我倒宁愿教语文哩②。谭秋教英文，兼任第一届乙班级任，他住在学校里，教学很负责，与同学的关系很好③。其他教职员也大多是倾向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我们教书，基本上是尽义务，象谭秋就只拿仅够个人生活的很少工资。在谭秋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教职员也是低薪或不支薪。我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④。

①、③董必武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一年）。

②《董老的嘱咐》，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青年报》。

④《桃李春风传马列——缅怀董老创办武汉中学的革命实践》，《人民教育》一九七八年第八期。

一九二〇年夏天，李汉俊从上海寄信到武汉来，要我们组织起来。于是我首先找谭秋商量，共同发起组织湖北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参加成立会的除我和谭秋外，还有张梅先、赵子健、包惠僧等。我们决定租用在湖北警察厅背后的一座房子作为小组碰头地点。为了避免敌人的注视，挂起了律师的招牌。那时，我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穿着长袍不好到工人中去，我们就到厂里去办夜校，或通过访问学生家长，或通过同乡、亲戚朋友的介绍到纱厂去，到铁路上去，到码头上去，到黄包车工人中去，找工人谈心，讲解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农民运动则利用学校放寒暑假，教员、学生回农村的机会来做。不久，还建立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和谭秋利用在学校任教的有利条件，把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吸收到团组织里来，青年团的组织伸展到各个大、中学校里。我们组织青年学习《〈资本论〉入门》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启发他们同不合理的旧教育、旧制度展开坚决的斗争^①。谭秋一参加党就拼命干，湖北党的工作主要是他负责^②。他以教书作为公开职业，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他除在武汉中学任教外，还在高师附小教书，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在那里。所以，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③。

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全国先后成立了六个共产主义小组，海外也有个别小组，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代表参加，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我和谭秋代表湖北。共产

①《董老的嘱咐》，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青年报》。

②董必武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一年）。

③董必武：《悼张栗原先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国际也派了代表马林来参加。我们的会议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开的。会议讨论了当时的政治情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章以及党的领导机构等问题。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中途被法国密探发现，为了避免敌人的破坏，最后一天会议是在嘉兴南湖的船上举行的。大会提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我记得很清楚，我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在这个宣言上，党已把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我们斗争的目标。指出这点很重要，这是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根本不同。在这之前，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并没有反殖民主义的内容。也有人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才提出这个口号，实际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距第一次代表大会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这个口号虽无文字记载可查，但我的记忆，我们的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高举了这个鲜明的旗帜^①。

“一大”结束后，我和谭秋回到武汉，仍以在学校教书作掩护从事党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当时，封建文人王式玉把持的湖北女子师范学校用封建礼教束缚学生，训练学生当贤妻良母，反对新思想的传播，连来往的书信也要检查，把女师搞得象个修道院。为了同封建文人争夺青年，谭秋、刘子通、黄负生和我先后到女师教书，谭秋教英文，我教国文，我们选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的好文章作教材，向学生灌输新思想，启发她们的觉悟。这就引起了封建遗老们的不满。一九二二年春，王式玉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解聘刘子通，并开除签名反对解聘的学生。为了反抗校方的无理压迫，夏之栩、徐全直、袁浦之等学生领袖发动和组织罢课斗争，并到省教育厅请愿。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潮。经过学生的坚决斗争，加之社会舆论的压力，

^①《董老的嘱咐》，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青年报》。

终于轰走了反动校长①。对被开除的夏之栩等同学，我们就把她们安置在一个教员家中继续学习，由我和谭秋轮流教她们②。

“二七惨案”后，谭秋曾转移到安源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回武汉。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湖北的党组织改为湖北省委，谭秋任组织部长，党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我以国民党革命派的面目出现，主要搞统一战线工作③。

大革命失败后，谭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一九三〇年在哈尔滨因机关被敌人破坏而被捕，吃了很多苦头，党营救出狱后，曾到江苏省委工作，于一九三三年进中央苏区，刚进苏区时，在党校教过一下书，后任福建省委书记，不久回瑞金任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长征后，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中负伤，伤愈后去苏联在第三国际工作。抗战爆发，一九三九年秋谭秋回国到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一九四三年牺牲在新疆④。



①、③、④董必武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一年）。

②《董老的嘱咐》，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青年报》。